

師大台灣史學報 No. 16-17

2024年2月29日出刊

BULLETIN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NTNU

TAIWAN

**跨越疆界的戰友：川島威伸、摩羅泰島
戰友會與臺灣人原日本兵**

楊文喬

跨越疆界的戰友：

川島威伸、摩羅泰島戰友會與臺灣人原日本兵*

楊文喬**

摘 要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曾經在戰場上一同作戰的日本人與臺灣人在戰後分屬於兩個不同的國家。不過，他們之間的交流並未結束，甚至在 1970 年代中後期，還有部分戰前的日本軍人與臺灣人原日本兵士站在同一陣線向當時的日本政府提出補償的要求。目前一般認為，臺灣人原日本兵對日本的索償運動，源於臺灣人殘留日本兵中村輝夫（阿美族名史尼育唔；漢名李光輝）於 1974 年 12 月在印尼摩羅泰島被發現。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位日本軍人橫跨了戰前、中村輝夫的發現以及接下來的索償運動。這位日本軍人是本文的主角川島威伸少佐，其戰時是輝第二游擊隊隊長，和中村輝夫在內的高砂族特別志願兵一同在摩羅泰島作戰；戰後，川島威伸則在前往摩羅泰島從事慰靈與遺骨收集時，得知尚有殘留日本兵滯留於叢林，並設法加以救援，而這位殘留日本兵即為中村輝夫；在川島威伸於 1989 年過世之前，其代表摩羅泰戰友會參加索償運動，並在法庭上替臺灣人原日本兵提出證言。川島威伸的一生，可說是橫跨了臺灣人原日本兵的戰時與戰後史。本文希望透過回顧川島威伸的一生、其和臺灣人原日本兵的互動，以及日本戰友會、慰靈以及遺骨送還的戰後史。來探討過往較少論及的日臺戰友交流史。

關鍵字：戰友、遺骨送還、川島威伸、中村輝夫、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

* 本文初版曾發表於「第十二屆臺灣近代戰爭史學術研討會」，感謝評論人康培德老師以及《師大臺灣史學報》兩位審查人的詳盡建議。也感謝陳柏棕、吳博臻以及王志淵長期在相關議題上的交流與指教。

**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99103044@nccu.edu.tw。

海軍工廠的生活步調很慢。我負責圖書館和挖洞的作業。用來疏散零件工廠的大型橫穴防空洞，就是我和一群臺灣少年工一起挖的。這些十二、三歲的小惡魔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朋友。他們教我臺灣話，我講童話故事給他們聽。他們堅信臺灣的神會保佑他們不被空襲炸死，而且將來有一天一定會送他們平安回國……¹

一、前言

在臺中寶覺禪寺的靈安故鄉紀念碑旁，有一座和平英魂觀音亭，亭中有塊碑銘刻著紀念碑與觀音亭的緣起，² 並記錄臺灣與日本的南星會以及海交會的行動。正是在凝視這塊碑文的時候，筆者萌生撰寫這篇文章的想法。³

「戰友」一般而言，指的是在「同部隊或艦艇以及同個戰場，一起戰鬥的夥伴」。這個詞彙的起源可能是在明治末期。真下飛泉在日俄戰爭後寫的知名軍歌以及帝國在鄉軍人會 1910 年開始發行的機關誌都名為〈戰友〉。不過令人意外的是，這個詞彙並未出現在軍隊相關的出版品中，而是在 1937 年日中戰爭開始後的軍歌及新聞才開始大量使用，這些歌曲大多間接吐露出失去戰友的悲哀，而不會直接提及戰友的死。⁴ 「戰友會」則是「戰友」戰後再次聚集而來的團體，⁵ 要到 1937 年日中戰爭後才開始出現。在日清戰爭與日俄戰爭時，軍隊的組成以鄉土連隊為主，歸來的戰友多住在附近，見面的機會很多，而帝國在鄉軍人會成立後，官方的集會也不少。在 1944 年以前的戰友會有兩種，分別是軍校同期生以及日

¹ 這段文字源自日本知名作家三島由紀夫的《假面的告白》。有趣的是，臺灣作家吳明益曾在《睡眠的航線》中提到少年工視角中的三島由紀夫：「平岡多數時候都在讀書或出神，但偶爾也會參與少年們挖掘防空洞的工作……如果遇到可能不會有空襲的陰雨天，或許平岡君會在休息時間為少年們講故事……平岡君為少年們說故事的時候，會叫少年們教他臺灣話，他的發音常引來少年的嘲笑……」。這些被稱為「少年工」的少年們，其身分其實是海軍軍屬，而他們在戰後集結而成的臺灣留日高座同學會更是臺灣規模數一數二的戰友會，對臺日之間的交流有著特殊的貢獻，甚至曾有戰友會成員得到旭日章。三島由紀夫著、劉子倩譯，《假面的告白》（新北：大牌出版，2021），頁 179-180；吳明益，《睡眠的航線》（新北：二魚文化，2007），頁 164、169。

² 可以參考臺灣中日海交聯誼會編，《和平英魂觀音亭：靈安故鄉紀念碑落成慶典暨臺灣中日海交聯誼會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紀念特刊》（臺中：臺灣中日海交聯誼會，1990 年）；轉引自陳柏棕，〈臺籍戰歿日本兵紀念場域的形塑：以新竹北埔濟化宮為例〉，《國史館館刊》62（2019 年 12 月），頁 188。

³ 那是在 2020 年 11 月。筆者剛結束一年半的漫長役期，到臺中寶覺禪寺憑弔戰死在新幾內亞ヤ力チの伯公楊木通。而之所以會注意到戰友的課題，也跟自身的服役經驗以及日本漫畫《黃金神威》有關：在特戰 22 連擔任連輔導長時，筆者也有了共患難的戰友；而《黃金神威》主角群的行動，也涉及憑弔、紀念在日俄戰爭中死去的戰友以及戰友的遺族。

⁴ 戰友会研究会，《戰友会研究ノ一ト》（東京：青弓社，2012），頁 37-42。

⁵ 同上註，頁 9。

中戰爭歸還兵士集結而成的戰友會；⁶ 之後的戰友會則更加多元。⁷ 臺灣也有戰友會，不過顧慮到戒嚴體制，往往會使用其他不同的名稱，如「同學會、懇親會、聯誼會、交友會、慶生會或宗教會」等等。⁸

本文主題是臺灣戰友與日本戰友的互動。主角川島威伸是出身於陸軍中野學校的日本軍官。⁹ 筆者在閱讀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之後簡稱「補償問題」）的資料時，注意到川島威伸這位日本軍官曾出席替臺灣人原日本兵提出證言。¹⁰ 而他也正好是 1974 年底發現中村輝夫的關鍵人物之一，其帶隊前往摩羅泰島從事慰靈與遺骨收集時，得知尚有殘留日本兵滯留於叢林，並設法加以救援，而這位殘留日本兵正是中村輝夫。¹¹ 而中村輝夫的出現則對補償問題有著巨大的影響。進一步回顧川島威伸的歷史，可以發現他在二戰時曾任輝第二游擊隊隊長，和高砂族特別志願兵一同在摩羅泰島作戰。¹² 另外，川島威伸的軍旅生涯時常和「異民族」並肩作戰，他在 1981 年時和其他南機關的關係者一同得到緬甸政府頒發的榮譽稱號「翁山之旗」，¹³ 表揚他們訓練緬甸獨立義勇隊對緬甸獨立運動的貢獻。¹⁴ 川島威伸橫跨臺灣人原日本兵的戰前與戰後，某種程度上，正是他和戰友會前往摩羅泰島的慰靈與遺骨收集行動，間接開啟了補償問題。本文打算以這位日本軍官以及其所屬的摩羅泰島戰友會為主角，探討臺日戰友在慰靈、戰友會、遺骨收集，以及補償問題等戰爭遺緒下的交流。

⁶ 戰友會研究会，《戰友會研究ノート》，頁 43-44。

⁷ 以下概述不同類別戰友會的組成，分別有軍校同期生、同單位、同戰場、地方、同部隊同科別、同戰場的部隊、同科別、舊職業軍人組織、俘虜收容所或戰犯收容所、遺族、二世、敬愛共同指揮官、共同戰爭體驗延伸的政治運動、女性的戰友會；同上註，頁 51-56。

⁸ 陳柏棕，《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海軍史》（新北：月熊出版，2018），頁 233。

⁹ 關於陸軍中野學校以及其和臺灣人的關係，可以參考田中俊男《陸軍中野学校の東部ニューギニア遊撃戦：台湾高砂義勇兵との戦勝録》（東京：戦誌刊行会，1996）。

¹⁰ 〈川島威伸氏 証人調書（第十一回口頭弁論）〉，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東京：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1993），頁 203-217。

¹¹ 相關過程可以參考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東京：モロタイ戦友会，1978），頁 432-433。

¹² 〈モロタイ 一人廿殺の奮戦 川島遊撃隊 闘ふ高砂族〉，《朝日新聞》，1944 年 12 月 25 日，版 2。

¹³ 南機關是日軍的一個特務機關，負責人是鈴木敬司大佐。其正式成立於 1941 年 2 月 1 日，目的是要援助緬甸的獨立。知名的緬甸三十志士就是由南機關所訓練，其中包括緬甸國父翁山。關於南機關的歷史與活動，可以參考南機關成員泉谷達郎撰寫的《ビルマ独立秘史：その名は南機関》（東京：徳間書店，1989）以及溝口郁夫，《秘録・ビルマ独立と日本人参謀：野田毅陣中日記》（東京：国書刊行会，2012）。

¹⁴ 〈〔ニュースすくらんぶる〕砲火の中で固い友情 旧日本兵へビルマ最高の荣誉称号〉，《讀賣新聞》，1981 年 1 月 16 日，頁 3。

在進入正題前，要先回顧相關的學術研究。目前還未有鎮密探討臺灣與日本戰友會如何交流的研究，甚至歷史學者注意到的，可能是日本人對臺灣人原日本兵的遺忘。如藍適齊在“(Re-) Writing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Forgetting and Remembering the Taiwanese-Native Japanese Soldiers in Postwar Taiwan”一文中，曾藉由原臺灣人日本兵林景明的口述以及人類學家蔡政良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觀察來說明日本人對臺灣人原日本兵的遺忘：¹⁵ 林景明表示「他們有一個傳統的人道，是怎麼樣呢？死去的戰友就要照顧，有的今天退休了……把自己的錢拿出來，做什麼？去撿骨」，但是「這些日本人，這麼顧戰友，對臺灣人呢，一毛不花。這就是日本人的反省」；¹⁶ 蔡政良則在韋瓦克（Wewak）附近發現一塊日本人在 1969 年設立的「英靈碑」，而這塊「英靈碑」上，並沒有高砂義勇隊的名字。¹⁷ 蔡政良因而認為「日本人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建立的紀念碑中，將高砂義勇隊遺忘了」。¹⁸ 日本人真的遺忘了臺灣人原日本兵嗎？在接下來的探討中，可以發現不全是如此。

關於臺灣的戰友會，目前還未有以其為主體的研究。筆者曾與吳博臻在收錄於《台灣兵：重尋一段被歷史遺忘的血淚青春》中的〈台籍日本兵及其戰後史〉一文裡概述臺灣戰友會。¹⁹ 吳博臻在其碩士論文《臺籍日本兵之「死」：遺族、戰友、二戰記憶與創傷》裡，亦曾描繪過臺灣戰友會成員如何紀念死去的戰友。²⁰ 這兩篇文章或許勉強可以提供「臺灣戰友會」這個主題一個粗略的概覽。其他關於

¹⁵ Shi-chi Mike Lan, “(Re-) Writing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Forgetting and Remembering the Taiwanese-Native Japanese Soldiers in Postwar Taiwan,” *positions* (North Carolina) 21: 4 (2013), pp. 829-831.

¹⁶ 林景明對日本戰友的理解是源於保阪正康在《文藝春秋》發表的〈戰友会の八月〉；周婉窈編，《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 53-55；保阪正康，〈戰友会の八月〉，《文藝春秋》72：10（1994 年 8 月），頁 268-283。

¹⁷ 除了「遺忘」外，還有一個可能是碑上是銘刻著高砂義勇隊的日本姓名：近藤正己在《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中曾討論原住民的「改姓名」問題，而他所調查到的北排灣族軍人與軍屬無一例外的都改／被改為日本姓名；摩羅泰島戰友會出版的《春島戰記》中刊載的〈モロタイ戦没者名簿〉，裡面的「高砂族」戰歿者也都是日本姓名；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327-348；〈モロタイ戦没者名簿〉，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戰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556-591。

¹⁸ 蔡政良，《從都蘭到新幾內亞》（臺北：玉山社，2011），頁 115-128。

¹⁹ 楊文喬、吳博臻，〈台籍日本兵及其戰後史〉，收於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編，《台灣兵：重尋一段被歷史遺忘的血淚青春》（臺北：國家人權委員會，2022），頁 83-88。

²⁰ 吳博臻，《臺籍日本兵之「死」：遺族、戰友、二戰記憶與創傷》（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2），頁 91-99。

臺灣戰友會以及臺灣戰友與日本戰友交流的敘述，則散見在少數研究，²¹ 以及臺籍日本兵的口述訪問中。²² 最後，臺灣人二戰遺族林阿貞留下的臺灣戰友會名冊中，亦包含著許多日本人士。²³ 由此可見，臺灣戰友與日本戰友的交流是個有潛力且有待繼續發展的領域。

日本學界也有關於戰友會的研究。最早的作品或許是 1983 年出版的《共同研究・戦友会》，可惜的是該書探討了戰友會的各面向，如戰友會的類型、政治、戰後史與慰靈行動，卻完全沒提到部分戰友會關注的補償問題。²⁴ 2011 年吉田裕的《兵士たちの戦後史》亦是類似情形，詳盡探討日本戰友會的歷史、時代背景與涉及的政治議題。²⁵ 不過關於臺灣人戰友，僅寫到臺灣步兵第二連隊戰友會在 1977 年於熊本縣護國神社建立的英靈彰顯碑，似乎有臺灣戰友的協力。²⁶ 而未對臺灣成立的戰友會以及臺日戰友會在補償問題的交流與行動有進一步的討論及分析。遠藤美幸的〈「戦友会」の変容と世代交代：戦場体験の継承をめぐる葛藤と可能性〉同樣未提到臺灣人，但其研究戰友會世代交替時發生的現象，值得援引到臺灣的戰友會研究。²⁷ 最新的戰友會研究是 2022 年 3 月底出版《「予科練」戦友会の社会学：戦争の記憶のかたち》，作者清水亮探討「予科練」（海軍飛行予科練習生）戰友會的軌跡、集團、記憶以及社會關係。²⁸ 雖然未提到臺灣人，但臺灣人參與「予科練」的人相當稀少，資料大概相當有限。²⁹ 最後，唯一以小

²¹ 如精研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的陳柏棕在《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海軍史》與《軍艦旗下：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1943-1945）》中曾討論過高志慶生會以及海交會；陳柏棕，《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海軍史》，頁 232-236；陳柏棕，《軍艦旗下：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1943-1945）》（臺北：國史館，2013），頁 274-276。

²² 如簡傳枝曾提到第一期陸軍特別志願兵組成的「南星會」的聚會不時會有日本戰友來臺。也有臺灣戰友前往日本參加戰友會的例子：如第二期陸軍特別志願兵蕭金海，由於部隊中多為日本人，所以戰友會的活動多在日本。關於這些散見於口述訪問中的敘述，可以參考前述吳博臻的碩士論文以及〈台籍日本兵及其戰後史〉一文。

²³ 這些臺灣戰友會包括高雄海兵團聯誼會、所羅門群島歸臺同仁慶生會、臺灣高座會、臺灣南星同學聯誼會，以及緬甸戰友會；杜正宇、陳姿仰，〈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館藏許昭榮、林阿貞捐贈文獻之評析〉，《高雄文獻》7：1（2017 年 4 月），頁 28。

²⁴ 高橋三郎、高橋由典、新田光子等著《新裝版 共同研究・戦友会》（東京：インパクト出版会，2005）。

²⁵ 吉田裕，《兵士たちの戦後史》（東京：岩波書店，2011）。

²⁶ 同上註，頁 114。

²⁷ 遠藤美幸，〈「戦友会」の変容と世代交代：戦場体験の継承をめぐる葛藤と可能性〉，《日本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14（2018 年 9 月），頁 9-21。

²⁸ 清水亮，《「予科練」戦友会の社会学：戦争の記憶のかたち》（東京：新曜社，2022）。

²⁹ 目前所知唯一的紀錄是日本軍方在 1944 年 10 月才在臺灣的海軍志願兵中甄選飛行予科練習生，最後在第一期與第二期海軍志願兵中錄取五十人，最後共有 45 人報到，他們在鹿兒島航空隊受訓後，再被分發到土浦航空隊；陳柏棕，《軍艦旗下：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1943-1945）》，頁 118-119；陳鵬仁、王雪娥編，〈林榮貞〉，《世紀之足跡：臺灣人日本海軍志願兵》（臺北：致良，2007），頁 175-179。

節專門探討臺灣人原日本兵戰友會的是 2012 年戰友会研究会的《戦友会研究ノ一ト》，可惜篇幅相當精簡，也未涉及臺灣戰友與日本戰友的交流。³⁰ 在 1974 年底中村輝夫被發現後，不少戰友會都曾關注過臺灣人原日本兵或是遺族的補償問題。這也是本文探討的主題之一。

戰友會本身的研究之外，另一個會談論到戰友會的就是補償問題的相關研究。可惜的是，不論是蔡慧玉的〈臺灣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初探：「潘朵拉之箱」〉或是陳鈺琪的碩士論文《王育德與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³¹，都只是簡短提到戰友會的參與。新井雄的〈日臺關係與台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以有馬元治的活動為中心〉一文也未關注有馬元治與戰友會的互動。³² 在臺灣人原日本兵士補償問題思考會（以下簡稱「思考會」）編輯的《台灣・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戰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一》（以下簡稱《補償問題資料集》）中，記錄著臺日戰友與戰友會的交流。³³ 本文希望可以藉此補充過往未深度討論的戰友會對補償問題的行動。

最後，值得特別一提的文章是 Beatrice Trefalt 收錄在 *The Pacific War: Aftermaths, remembrance and culture* 一書的 “The endless search for dead men: Funasaka Hiroshi and fallen soldiers in post-war Japan”。這篇文章的主角是有「不死身的分隊長」之稱的船坂弘（Funasaka Hiroshi）軍曹，他在 1944 年的安加爾戰役（Battle of Angaur）生還，可說是日本戰後最廣為人知的老兵社會運動參與者。船坂弘認為，他作為一個倖存者的任務是要記住在帛琉還有其他太平洋島嶼犧牲的同袍：在 1946 年遣返後，他每晚都夢到他死去的部屬，這些死去的戰友哀求他收集他們的遺骨，而船坂弘也對他們保證，他會為了他們重返戰地。戰後船坂弘在澀谷開了家小書店，成為多產的非虛構創作作家，並利用賣書的收入來支付其不斷前往太平洋戰地豎立慰靈碑的費用。透過回顧船坂弘的作品及其戰後活動，Beatrice Trefalt 探討了戰後日本的二戰戰歿者問題及戰爭遺緒。船坂弘的活動，

³⁰ 〈台湾人日本兵の戦友会〉，收於戰友会研究会，《戦友会研究ノ一ト》，頁 115-117。

³¹ 蔡慧玉，〈臺灣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初探：「潘朵拉之箱」〉，《臺灣史研究》3：1（1996 年 6 月），頁 190-191；陳鈺琪，《王育德與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頁 49-50。

³² 新井雄，〈日臺關係與台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以有馬元治的活動為中心〉，《大仁學報》51（2017 年 9 月），頁 133-148。

³³ 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灣・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戰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一》。

體現了日本戰後慰靈與遺骨收集的歷史。³⁴ 本文則希望透過川島威伸的活動來重構摩羅泰戰友會和臺灣人原日本兵互動的歷史與歷史背景。

二、戰場在摩羅泰島：川島威伸與高砂特別志願兵

本文的主角川島威伸在 1914 年 8 月 27 日出生於千葉縣柏市。本節將回顧他的經歷、其與跟高砂特別志願兵的相遇，以及他們在摩羅泰島一同經歷的那場戰爭。要如何重構臺日戰友在戰場的互動呢？除了少數的報導外，戰友會的出版品是個值得研究的方向。³⁵ 接下來要使用的材料是摩羅泰島戰友會出版的《春島戰記：あゝモロタイ》（以下簡稱《春島戰記》）。《春島戰記》出版於 1978 年，這時期正是戰友會部隊史出版的最盛期：有 65% 的部隊史在 1975 年到 1984 年間出版；1965 年到 1974 年則只有 25%。³⁶ 這本戰記中，我們不時可以看到臺灣人（特別是高砂族）的身影。³⁷

根據川島威伸在補償問題時期擔任證人時的履歷。³⁸ 其在 1936 年 10 月 1 日成為步兵少尉，軍旅生涯的初期是在滿洲國以及「北支」活動，並曾在張家口附近的戰鬥中身受重傷。其在 1940 年 8 月 1 日晉升步兵大尉，在 9 月進入陸軍中野學校，於 11 月 30 日結業。1941 年 2 月 1 日起，川島威伸被分派到南機關處理緬甸相關的勤務，其在 2 月 10 日從博多出發，於 2 月 16 日抵達泰國曼谷，並在泰國從事對緬甸相關工作。5 月 20 日，移動到海南島三亞訓練脫離緬甸的青年。

³⁴ 類似研究「小人物」的取徑被稱為微觀史。最有名的作品或許是義大利文化史家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著、魯伊譯的《奶酪與蛆蟲：一個 16 世紀磨坊主的宇宙》（*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其透過一位 16 世紀磨坊主的審判檔案來探討當時的常民思想與大眾文化。近期臺灣出版翻譯的琳達·柯利（Linda Colley）著、馮奕達譯，《她的世界史：跨越邊界的女性，伊莉莎白·馬許與她的十八世紀人生》（新北：衛城出版/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2）也是類似的作品。Beatrice Trefalt, “The endless search for dead men: Funasaka Hiroshi and fallen soldiers in post-war Japan,” in Christina Twomey and Ernest Koh, eds., *The Pacific War: Aftermaths, remembrance and culture*. (Abingdon: Routledge, 2015), pp. 270-281.

³⁵ 同為第二游擊隊的卑南族陳德儀（格拉賽、岡田耕治）也曾撰寫過摩羅泰島「戰記」。不過筆者比較其與《春島戰記》後，認為陳德儀的「戰記」應該是其在戰後以《春島戰記》為基礎增補自己的回憶。因此接下來還是以《春島戰記》為主；陳德儀著、林哲次譯，《一位高砂志願兵的摩羅泰島戰記》（臺東：臺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2017）。

³⁶ 吉田裕，《兵士たちの戦後史》，頁 156-157。

³⁷ 值得一提的是，鍾肇政「高山組曲」的第二部〈戰火〉即是高砂特別志願兵在摩羅泰島戰鬥的故事。主角是布農族林兵長以及「鬼軍曹」和田芳三曹長，偶爾也會出現川島威伸。〈戰火〉的諸多細節都和《春島戰記》相符，或許鍾肇政取材時曾閱讀過《春島戰記》；鍾肇政，〈戰火〉，《鍾肇政全集 9》（桃園：桃園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235-475。

³⁸ 〈川島威伸氏 証人調書（第十一回口頭弁論）〉，頁 203-217。

10 月 10 日，移動到花蓮玉里，繼續訓練緬甸青年。³⁹ 12 月 5 日，川島威伸回到南方軍總司令部，其在 1942 年前半年通過泰緬邊境，在土瓦、毛淡棉以及北部緬甸等地作戰。6 月 18 日後則擔任第 15 司令軍部附，7 月 28 起擔任緬甸幹部候補生隊附，隔年 4 月 3 日起擔任緬甸方面軍司令隊附。川島威伸在這段期間，似乎和後來有緬甸之父之稱的翁山建立起不錯的交情。在 1945 年 1 月 9 日川島游擊隊於摩羅泰島面對兵力數倍的美軍從事游擊戰的消息公開後，⁴⁰ 當時是緬甸獨立運動指導人的翁山，因擔心川島威伸可能會玉碎，還曾發送電報關心。⁴¹ 川島威伸在 1943 年 5 月 20 日回到日本擔任陸軍士官學校留學生隊附，並於 8 月 2 日晉升少佐。9 月 1 日後，其回到陸軍中野學校指導游擊戰，其這時指導的學員往後會和他一起經歷漫長的戰爭。12 月 30 日再度來到臺灣。1944 年 1 月 20 日，川島威伸擔任游擊第二中隊長，在湖口陸軍演習場從事游擊戰的訓練。這也是他和高砂族特別志願兵相遇的開始。⁴²

在 1927 年 12 月實施的《兵役法》中，日本兵役制度有兩種：徵兵，20 歲的國民若身體檢查合格就會被徵兵；志願兵，未滿 20 歲但年滿 17 歲的男子可以透過志願兵申請加入軍隊。⁴³ 1938 年 2 月，朝鮮頒發《陸軍特別志願兵令》，臺灣則是在 1941 年 6 月才通過。⁴⁴ 除了三期陸軍特別志願兵外，其實還有招募兩期高砂族陸軍特別志願兵，在 1943 年 11 月第一期錄取約五百人，1944 年 9 月錄取約八百人。⁴⁵ 開始招募高砂族陸軍特別志願兵的可能原因是高砂義勇隊在南洋戰場的發揮。在陸軍中野學校的游擊隊戰鬥教案裡，就包含著「高砂義勇兵的特性」。⁴⁶

根據摩羅泰島戰友會的回顧，第一期約 500 人高砂族陸軍特別志願兵在 1943 年 11 月 1 日就開始在湖口演習場實行基礎訓練，這 500 人中也包括十幾位曾經參加比島進攻作戰的高砂義勇隊員。1944 年 1 月 20 日後，高砂特別志願兵的成

³⁹ 關於日軍在臺灣對緬甸青年的訓練，可以參考施正鋒，〈緬甸國父翁山與台灣的邂逅〉（2022 年 9 月 7 日），「台灣法律網」，<https://www.lawtw.com/archives/1100048>，2023 年 7 月 31 日瀏覽；蕭明禮、朱泓源，〈日本侵緬之戰（1940-42）與臺灣的角色〉，《亞太研究論壇》67（2020 年 6 月），頁 7-14。

⁴⁰ 〈モロタイに遊撃戦 敵陣八十箇所に進襲〉，《朝日新聞》，1945 年 1 月 9 日，版 1。

⁴¹ 〈長期游撃戦へ転移〉，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208-209。

⁴² 〈川島威伸氏 証人調書（第十一回口頭弁論）〉，頁 216。

⁴³ 寺田近雄，〈志願兵〉，收於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コンパクト版（上）》（東京：新人物往來社，2003），頁 130。

⁴⁴ 寺田近雄，〈特別志願兵制〉，收於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コンパクト版（上）》，頁 158-159。

⁴⁵ 陳柏棕，《軍艦旗下：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1943-1945）》，頁 29-32。

⁴⁶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頁 398-399；菊池一隆，《日本軍ゲリラ 台湾高砂義勇隊：台湾原住民の太平洋戦争》（東京：平凡社，2018），頁 96-98。

員編成為四個中隊：游擊第一中隊隊長是神田泰雄少佐；游擊第二中隊隊長則是川島威伸少佐；游擊第三及第四中隊則在楠本義雄准尉的指導下繼續從事基本訓練。編成後的第一、第二中隊在陸軍中野學校出身的幹部指導下，從事南方戰場游擊戰的相關訓練。⁴⁷ 擔任小隊長的山口勇三認為這些高砂族的志願兵是質樸、單純的好青年，也是很有忠誠心的好軍人，非常有決心跟責任感。他們對能成為正規的日本軍人感到開心，因為他們的前輩多數是以軍屬的身分從軍。⁴⁸ 這其中也包括後來成為兵長的泰雅族武田義弘，其在 1937 年 20 歲時於農業講習所學習，在參加 1937 年 9 月於總督府前廣場舉行的出征軍人送別會後，他就決心要前往戰場。⁴⁹

5 月 28 日，游擊第一中隊與第二中隊從高雄出發，並在 6 月 2 日抵達馬尼拉。⁵⁰ 武田義弘在船團離開高雄港時於心中默念「祖國臺灣阿，再見了」，並在航行中擔心會遭遇潛水艇襲擊。⁵¹ 在馬尼拉，他們持續從事游擊戰的訓練。⁵² 7 月 5 日，游擊第二中隊在哈馬黑拉島的加萊拉（日文ガレラ；英文 Galela）基地上陸。神田泰雄帶領的游擊第一中隊則留在呂宋，後來有部分成員參加薰空挺隊。⁵³ 7 月 12 日，以游擊第二中隊為基幹，編入游擊第三、四中隊以及部分步兵第二一一聯隊成員，正式編成第二游擊隊，⁵⁴ 游擊隊隊長為川島威伸少佐，隊員共計 484 名，其中包括 371 名高砂特別志願兵。編成後的第二游擊隊在第三十二師團長石井嘉穗中將的指揮下前往摩羅泰島，任務是阻礙敵軍的進攻。⁵⁵ 游擊隊在同日抵

⁴⁷ 〈台湾における部隊訓練〉，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17-18。

⁴⁸ 山口勇三，〈高砂兵を部下として〉，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21。

⁴⁹ 武田義弘在 1942 年參加高砂報國挺身隊前往菲律賓，平安歸國後又再 1943 年 11 月參加高砂陸軍特別志願兵，並和川島威伸一同前往摩羅泰島；林源治〈特別志願兵として〉，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22-27；門脇朝秀編，《台湾高砂義勇隊—その心には今もなお日本が—》（東京：あけぼの会，1994），頁 35-40。

⁵⁰ 〈川島威伸氏 証人調書（第十一回口頭弁論）〉，頁 216。

⁵¹ 林源治，〈比島マニラ港に上陸〉，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27-29。

⁵² 林源治，〈いよいよモロタイ島へ〉，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36-37。

⁵³ 第一中隊成員後來有 48 人在 11 月 26 日午夜和 12 位日本軍士官分批搭乘四臺零式運輸機襲擊美軍的機場，無人生還。這場行動是「義号作戰」，也就是現在一般人較熟悉的薰空挺隊，領導的軍官是陸軍中野學校出身的中重男中尉。另外，原本帶領第一中隊的神田泰雄少佐則在義号作戰實施後自殺。土橋和典，《忠烈拔群・台湾高砂義勇兵》（東京：戦誌刊行會，1994），頁 193、233-239；菊池一隆，《日本軍ゲリラ 台湾高砂義勇隊：台湾原住民の太平洋戦争》，頁 136；〈一念部下と敵地 育ての親 神田部隊長〉，《朝日新聞》，1944 年 12 月 3 日，版 2；〈特攻「薰空挺隊」出撃す 震撼するドラッグ・ブラウエン飛行場 四輪送機で強行着陸 敵要部に決死突入 中重男中尉が指揮 大なる戦果を収む〉，《朝日新聞》，1944 年 12 月 3 日，版 1。

⁵⁴ 桑正彦，〈ガレラの思い出〉，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31-32。

⁵⁵ 川島威伸，〈モロタイ島高砂兵の勇戦〉，《歴史と人物》，9：8（1979 年 8 月），頁 78-79。

達摩羅泰島，從事戰鬥準備、地理調查、資源整補、指導現地住民等等，並召集島上的青年從事兵補的訓練。⁵⁶

9 月 15 日，美軍上陸。《朝日新聞》在 1944 年 12 月 25 日以及 1945 年 1 月 9 日均曾報導川島威伸以及高砂族的游擊戰，⁵⁷ 可惜都沒有（無法）提到太多細節。想知道更多戰場的實況，還是要參考《春島戰記》，這本戰記對延續將近一年的戰鬥有豐富的記錄。這些戰記由生還的戰友們在戰後編寫而成，詳盡地記載戰鬥的情況以及戰友的死亡（這其中當然也包括高砂戰友）。⁵⁸ 高砂族的戰記也編列其中，撰寫人是泰雅族的武田義弘以及排灣族的串岡次郎。接下來將不一一回顧縝密的戰鬥記錄，而是著重在臺灣與日本軍人一同出現的部分。⁵⁹

1944 年 10 月底，由於考量到糧食自給，柴田准尉指示軍曹遠藤弘帶著五人前往河流上游採取西谷椰子的澱粉，這五人中包括高砂兵中村輝夫，他們在 11 月 3 日平安歸隊；⁶⁰ 11 月 5 日晚上八點，吉田攻擊隊在攻擊瓦馬飛行場（日文ワマ；英文 Wama）時全員玉碎，攻擊隊的 8 人中，有 3 人是高砂兵，分別是來自中央山脈的田上定雄一等兵、來自南部的石川登一等兵，以及來自東部的石村一郎一等兵。川島威伸在回憶時提到，他們是出生不同地區的不同種族，卻超越種族的障礙與攻擊隊隊長一同勇敢作戰，他認為這是相當崇高的行為；⁶¹ 同樣在 11 月 8 日，山口勇三少尉利用拂曉時反覆渡河，計畫運送攻擊物資支援飛行場的攻擊。過程中，高砂族山村一等兵溺水，最後和前往救援的松井曹長，兩人一同消失在水中。山口勇三雖然悲慟，但他也知道這樣忘我拯救下屬的行為是身為上級應有的責任；⁶² 1944 年 11 月 16 日，帶著必死決意的游擊隊長川島威伸親自帶隊攻擊瓦馬飛行場遲遲未歸，⁶³ 和田芳三曹長只能懷著悲痛的心情離開待命位置，和高砂兵中的精銳武田一等兵等五人往二零高地移動；⁶⁴ 戰爭末期，陷入自活體制困

⁵⁶ 堀內健示，〈モロタイ游撃隊の戦闘準備〉，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35-36。

⁵⁷ 〈モロタイ 一人廿殺の奮戦 川島遊撃隊 闘ふ高砂族〉；〈モロタイに遊撃戦 敵陣八十箇所に進襲〉，《朝日新聞》，1945 年 1 月 9 日，版 1。

⁵⁸ 直到戰後，每當戰友離世，戰友會還會撰文懷念、祈福，這其中也還是包括「高砂戰友」。如 1973 年 5 月 15 日去世的上等兵陳正雄（舊姓若原）；〈菅原、秋葉兩世話人の逝去〉，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399。

⁵⁹ 《春島戦記》中提到高砂兵的部分非常多，無法逐一條列。僅以其中幾則作為代表。

⁶⁰ 遠藤弘，〈サゴ澱粉の採取〉，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99。

⁶¹ 川島威伸，〈吉田攻撃隊の玉碎〉，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108。

⁶² 山口勇三，〈松井曹長の戦死〉，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111-112。

⁶³ 岡田耕治回憶「平常不嚴肅的川島游撃隊長，這一天卻不一樣，穿著正式軍裝，配軍刀，親自站在陣頭指揮本部攻擊隊」；陳德儀著、林哲次譯，《一位高砂志願兵的摩洛泰島戰記》，頁 44。

⁶⁴ 和田芳三，〈游撃隊長の搜索〉，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115-116。

頓的堀內健示中尉以及山口勇三少尉在三十多年的很久以後撰寫的回顧中，不約而同提到因為高砂兵優秀的狩獵技巧，他們才能從戰場生還。即便如此，高砂兵還是相當服從長官的命令，指揮系統得以免於崩潰。⁶⁵ 這些敘述刊載於 1978 年出版的《春島戰記》中，那些戰場上的種種，接敵、戰鬥、死亡、求生在三十多年後依然歷歷在目。或許正是這些戰場上無法忘記的經驗以及不分種族的共同作戰，才讓摩羅泰島戰友會在戰後如此支援補償問題吧。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玉音放送，宣告投降。不過散落在戰場各地的部隊們無法在第一時間就得知戰爭已經結束。哈馬黑拉島較早得知終戰的消息，島上的步兵第二一一連隊在 8 月 30 日組成摩羅泰島搜索隊，並在隔日前往摩羅泰島傳達停戰的命令。⁶⁶ 川島威伸約在 9 月初接到「終戰」的消息，得知敗戰現實的他感受到強烈的衝擊。⁶⁷ 高砂兵們則難以置信的詢問「這是真的嗎？日軍什麼時候反擊？」而日本軍士官們則不知道該如何回答。⁶⁸ 9 月 3 日起，各部隊分批前往美軍的收容所。川島威伸即是在 9 月 3 日進入美軍收容所。⁶⁹ 9 月 24 日，游擊隊的生還者在川島威伸的指揮下回到哈馬黑拉島的加萊拉基地。10 月 5 日，游擊隊正式解散。⁷⁰ 川島威伸部隊下生還的 172 名高砂族隊員約在 11 月時，轉往坎拉哈（日文ガムラハ；英文 Gamraha）等待復員船隻。卑南族的岡田耕治回憶離別時川島威伸曾對一群高砂兵說：

大家非常辛苦了，明天我們要互相離別了，你們當日本兵真為日本努力，回去臺灣以後，請你們跟戰死的戰友家屬說他們的子弟真盡了力，為國犧牲，並好好安慰他們。高砂族的各位，相信你的酬勞今後終有一天有所回饋……心中有談不完的話，但只怕沒有時間了，各位高砂兵，祝你們健康，祝福你們，再見！⁷¹

⁶⁵ 堀內健示，〈マカン作戰における高砂兵〉，收於モロタイ戰友會編，《春島戰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289-290；山口勇三，〈マカン作戰における高砂兵〉，收於モロタイ戰友會編，《春島戰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290-291。

⁶⁶ 前田久氣，〈終戰の伝達〉，收於モロタイ戰友會編，《春島戰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304-307。

⁶⁷ 同上註，頁 304-307；川島威伸，〈終戰〉，收於モロタイ戰友會編，《春島戰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310。

⁶⁸ 佐藤愛子，《スニヨンの一生》（東京：文藝春秋，1984），頁 39。

⁶⁹ 〈川島威伸氏 証人調書（第十一回口頭弁論）〉，頁 215-217。

⁷⁰ 〈ハル本島へ歸還〉，收於モロタイ戰友會編，《春島戰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325-329。

⁷¹ 岡田耕治回憶中在場的高砂兵還有烏來的武田兵長、花蓮人中野兵長、新竹人谷田兵長、霧社人秋元兵長以及高雄人渡邊兵長；陳德儀著、林哲次譯，《一位高砂志願兵的摩羅泰島戰記》，頁 50。

在坎拉哈等待復員的還有一位臺灣人軍醫、一位朝鮮准尉以及一千一百多名軍屬(其中有四百多名朝鮮軍屬)。負責帶領臺灣人的是原第一野戰病院軍醫張兒雄，朝鮮人則由朝鮮准尉帶領。他們在坎拉哈打造房舍並設法獲得生存所需的食物。根據張兒雄的回憶，臺灣出身的軍屬有不少人是漁夫，而川島部隊的高砂兵則善於打獵，也因此他們攝取到充分的蛋白質。根據張兒雄的回憶，這群臺灣人在 1946 年 6 月初和張兒雄搭上一艘大貨船，而船上已經搭載了一千多名來自西部幾內亞以及比亞克島的臺灣軍屬。川島威伸接受《中央公論》訪問時，則表示高砂兵是在 4 月底離開，而他和內地人幹部們，終身難忘離別時隊員們放手吶喊的場景。⁷² 離開哈馬黑拉島後，這艘船先前往摩羅泰島卸貨，接著才航向臺灣。若依據張兒雄的回憶，他們抵臺的可能時間是 1946 年 6 月 10 日或 12 日；若依據川島威伸的回顧，那麼抵臺的時間可能在 5 月初。總之，在離開摩羅泰島約一周後，川島威伸部隊下生還的 172 名臺灣出身者在張兒雄的帶領下，回到基隆港。迎接他們的，是講著北京語的官員以及轉由中國政府統治的故鄉。⁷³

三、重返摩羅泰島：慰靈、遺骨收集與中村兵長的生還

本節我們同樣將透過《春島戰記》來回顧戰後臺日戰友們的交流。1970 年，輝遊會（二戰遊友會）在 9 月 15 日成立，這是摩羅泰島攻防戰開始的日期。隔年改名為摩羅泰島戰友會（モロタイ戦友会），「世話人」⁷⁴ 即是川島威伸。戰友會在 1971 年 9 月 15 日於靖國神社舉辦第一次戰歿者慰靈祭，而其創辦後的方針即是希望可以早日實現摩羅泰島的遺骨收集。⁷⁵ 1971 年到 1975 年正是日本戰友會成立的最盛期，其背景是日本官方對遺骨收集的消極以及軍人恩給的大幅增加。⁷⁶

摩羅泰島戰友會的成立，涉及到戰後日本慰靈與遺骨收集的歷史。⁷⁷ 根據日

⁷² 川島威伸，〈モロタイ島高砂兵の勇戦〉，頁 84。

⁷³ 張兒雄，〈高砂兵の復員〉，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戰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352-361。

⁷⁴ 可譯為負責人、發起人或代表人，但這三個翻譯又無法完全涵蓋彼此的意涵。因此本文接下來將繼續使用「世話人」一詞。

⁷⁵ 〈モロタイ戦友会の結成〉，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戰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386-388。

⁷⁶ 吉田裕，《兵士たちの戦後史》，頁 161-162、169-170。

⁷⁷ 關於慰靈與遺骨收集的相關研究，可以參考 Beatrice Trefalt, "Collecting Bones: Japanese Missions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War Remains and the Unfinished Business of the Asia-Pacific War," *Australian Humanities Review* (Canberra) 61 (May, 2017), pp. 145-159；栗原俊雄，《遺骨：戦没者三一〇万人の戦後史》（東京：岩波書店，2015）；浜井和史，《海外戦没者の戦後史：遺骨帰還と慰霊》（東京：吉川弘文館，2014）；浜井和史，《戦没者遺骨収集と戦後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2021）。

本厚生省的估算，日本二戰的海外戰歿者高達兩百四十萬人。最早送還的遺骨是由軍人個人帶回的戰友遺骨。接著要到 1952 年舊金山和約生效後，日本政府才在國民的強烈要求下，先是於 1952 年前往硫磺島調查，接著在 1953 年開始第一期的遺骨收集計畫（硫磺島、沖繩、馬里亞納諸島、菲律賓、貝里琉），到 1958 年結束時，共送還 11,358 柱遺骨；要到 1967 年才有第二期的遺骨收集計畫，預計到 1972 年結束，當時由於日本經濟高度成長，國民生活安定，許多戰歿者的遺族與戰友前往親友戰歿地探訪，並發現更多戰歿者的遺骨。最後共在加羅林群島、馬紹爾群島、吉爾伯特群島、新幾內亞島、所羅門群島、俾斯麥群島、馬來西亞以及韓國，送還 82,679 柱遺骨。⁷⁸ 可以注意到，兩期計畫所送還的遺骨還不到十萬柱，還有許多戰地未前往，且跟 240 萬戰歿者還有很大的差距。這些遺骨收集計畫未涉及的戰地中，就包括摩羅泰島。

戰友會成員和田芳三跟山口勇三在 1973 年 7 月 27 日從羽田機場出發前往摩羅泰島調查，並在 8 月 14 日歸國。他們在回程過境臺北時，曾和臺灣的戰友武田（林源治、武田義弘）兵長見面，而其也表示希望之後能參加遺骨收集的活動。在收到 8 月 7 日傳回的「調查成功」報告後，⁷⁹ 川島威伸和原第三十二師團參謀長星野一夫帶著報告書前往厚生省援護局陳情，希望可以在隔年 1974 年前往摩羅泰島遺骨收集。最後確定可以在 1974 年 11 月 11 日到 12 月 12 日間實施。⁸⁰ 這可能跟第三期的遺骨收集計畫有關。殘留日本兵橫井庄一於 1972 年 1 月 24 日在關島被發現後，政府與國民再度注意到過往的戰爭，大眾媒體的報導也讓殘留日本兵與遺骨的關注再度攀升，進而催生出第三期的計畫。⁸¹

重返戰場的路很漫長。1974 年 11 月 15 日，遺骨收集團從東京出發，參加人員除了舊軍人 12 名外，還有厚生省職員 5 名、日本遺族會人員 5 名以及青年遺骨收集團 4 名。⁸² 這其中並未包括前面提到的臺灣戰友武田義弘，雖然他本人熱切的希望能自費參加，但遺憾的並未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出國許可。⁸³ 收集團同

⁷⁸ 栗原俊雄，《遺骨：戦没者三一〇万人の戦後史》，頁 124-140。

⁷⁹ 在報告書中，除了摩羅泰島的基本介紹外，也包括他們所知的戰地以及當年的戰況，其中有段紀錄高砂兵山中、中村和磯野憲兵在テライ和美軍交戰，負傷後被美軍俘虜；モロタイ戦友会，〈現地予備調査の実施〉，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407-413。

⁸⁰ 〈現地予備調査の実施〉，頁 407-413。

⁸¹ 第三期的實施時間為 1972 年到 1975 年；栗原俊雄，《遺骨：戦没者三一〇万人の戦後史》，頁 140-141。

⁸² 〈遺骨収集の実施〉，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413-414。

⁸³ 〈武田元兵長の來日〉，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398-399。

日抵達雅加達後，整備所需，在 19 日抵達馬納多（日文マナド；英文 Manado；舊稱萬鴉佬）這個位於蘇拉威西島北方的城市，21 日抵達特那提（日文テルナテ；英文 Ternate），要到 24 日才抵達摩羅泰島的達魯巴（日文ドルバ；英文 Daruba），並於隔天分成三隊開始收骨作業。⁸⁴ 12 月 2 日，在達魯巴東北側的舊日軍飛行場舉行收集所得 124 柱遺骨的燒骨與慰靈儀式，現場懸掛著印尼和日本的國旗，除了收集團外，參加的還有當地官民以及負責警護的大尉。⁸⁵ 慰靈活動結束後，空軍基地的 Soeparpi 中尉招待收集團的幾位成員到官舍，並透露出摩羅泰島可能還有殘留日本兵的消息。⁸⁶ 遺骨收集團在 12 月 2 日得到情報後迅速跟日本大使報告。當時的駐印度尼西亞防衛駐在官湯野正雄表示，川島威伸在得知情報後拜託他「希能務必能好好地仔細尋找」。⁸⁷ 而大使向日本政府請示後，正式向印度尼西亞政府請求救援。⁸⁸ 印度尼西亞政府命令達魯巴空軍基地派人搜索，帶隊前往的 Soeparpi 中尉在 12 月 18 日發現確實仍有日本兵滯留在摩羅泰島，⁸⁹ 而這位日本兵正是中村輝夫。⁹⁰ 根據湯野正雄的回憶，中村輝夫在第一次跟他見面時曾對他說「由於一定要跟隊長川島少佐報告，請讓我見他」。⁹¹

得知中村輝夫生還後，川島威伸很快就捐款 10 萬日圓給中村輝夫。⁹² 而戰友會也很快就出現要派代表前往臺灣慰勞中村兵長的意見。於是 1975 年 1 月 9 日起，川島威伸屢次前往亞東協會訪問，⁹³ 打聽是否能前往臺灣，並得到歡迎的說法。最後決定由山口勇三以及川島威伸前往臺灣。⁹⁴ 為何是這兩個人呢？山口勇三自述因為曾來臺灣商業交易，並住過中村輝夫的故鄉臺東都歷附近，所以才被選為代表。至於川島威伸呢？山口勇三表示，川島威伸是「理所當然的代表者」。川島威伸在看中村輝夫於雅加達舉辦的記者會時聽到「想跟長官川島少佐碰面，

⁸⁴ 〈遺骨収集の実施〉，頁 413-416。

⁸⁵ 川島威伸，〈追悼の辞〉，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432。

⁸⁶ 〈生存者情報の入手〉，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432-433。

⁸⁷ 湯野正雄，〈中村元一等兵收容の記〉，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433-436。

⁸⁸ 日本官方之所以會如此重視類似訊息，也跟殘留日本兵橫井庄一以及小野田寬郎陸續在關島以及盧邦島被發現有關。關於他們被發現的歷史，可以參考 Beatrice Trefalt, *Japanese Army Stragglers and Memories of the War in Japan, 1950-1975*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111-159.

⁸⁹ 〈中村兵長の生還〉，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433-439。

⁹⁰ 族名史尼雍，目前普遍流傳的為漢名李光輝。

⁹¹ 湯野正雄，〈中村元一等兵收容の記〉，頁 434。

⁹² 〈三十多年一文不名 甫履塵寰身價百萬〉，《聯合報》，1975 年 1 月 9 日，版 3。

⁹³ 亞東協會即是後來的臺日關係協會。

⁹⁴ 〈會員代表の渡台慰勞〉，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439。

真的很想念他」，因而覺得很痛苦也有責任，他表示「真想立刻去雅加達，我也很想見中村」。山口勇三在 1 月 31 日先行抵達臺北，川島威伸則預計在 2 月 3 日出發。然而，再會的期盼破滅了。川島威伸在 2 月 2 日晚上聯絡山口勇三，表示自己突然被臺灣政府通知不許可入國，原因則不清楚。⁹⁵

這其實並不是川島威伸第一次被中華民國政府機關拒絕。稍早的 1975 年 1 月 20 日，亞東關係協會文化組長鍾振宏收到富士電視通知，表示希望能透過臺視衛星轉播 15 分鐘，讓中村輝夫跟川島威伸透過衛星中繼面對面會談。鍾振宏認為富士電視「對我態度最為友好」，因此希望局長同意。他表示，這個計畫的緣由是富士電視的人員表示「據渠等採訪結果，獲知李光輝君極望能見到其原直屬長官川島氏」。而臺視已經許諾，只待上層同意，李光輝本人也接受臺視的安排。⁹⁶ 1 月 22 日，廣播電視處的公文表示「本案關係國家政策，擬先函請中央文化工作會」，旁邊的意見則寫道「此事大有商榷餘地」。1 月 29 日，在與中央文工會的吳主任接洽後，得到的答案是「此時不宜舉辦此節目」、「擬不同意鍾振宏君之請求」、「以李光輝不願接受此項訪問為藉口婉告日方」。1 月 31 日，最後的檔案寫在行政院新聞局的便籤上，「奉指令，不同意製作李光輝電視節目」。⁹⁷ 拒絕這場對談的吳主任是歷史學者吳俊才，而其所屬的中央文工會其實是國民黨負責宣傳的單位，全名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傳播工作會。由此可見這時黨政不分的情形。

為什麼當時的政府／國民黨不肯讓川島威伸跟中村輝夫見面呢？或許是擔心兩位臺日戰友的閒話家常，無法見容於當時的媒體宣傳與歷史認識吧。在當時的媒體報導中，中村輝夫被日本軍閥強迫入伍，同時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曾有媒體報導「他是在第二次大戰即將結束時，被日軍強征」，⁹⁸ 「李光輝的一生何等坎坷……他是日本軍國主義下的犧牲者」。⁹⁹ 更有媒體人的書寫表示中村輝

⁹⁵ 山口勇三，〈中村輝夫君訪問記〉，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439-442。

⁹⁶ 〈頃接日本富士電視公司報導局節目報導部部長植木雄輔來處洽請協助該公司企畫透過「臺灣電視公司」與「富士電視」衛星轉播安排李光輝君與其原屬部隊直屬長官川島威伸作遠隔見面會談節目事〉，《黨務文書案》，「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檔案，（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62/0636/R00001/011/029。

⁹⁷ 〈日本富士電視公司要求透過臺灣電視公司安排轉播李光輝與其在日本長官川島威伸電視會談節目事〉，《黨務文書案》，「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檔案，（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62/0636/R00001/011/028。

⁹⁸ 〈為李光輝回國進一正解〉，《中央日報》，1975 年 1 月 8 日，版 2。

⁹⁹ 〈榮譽「發言人」談李光輝還鄉記〉，《聯合報》，1975 年 1 月 14 日，版 12。

夫曾想砍死或毒死日本士官。¹⁰⁰ 在 1975 年的臺灣「國語」群體裡，有兩種戰後不斷形塑而來的臺籍日本兵集體記憶：一種是「極度可憐」的曼南島臺籍戰俘與臺籍殘留日本兵，一種是「英勇反抗」的海南陣前起義義士。中村輝夫的形象融合這兩者，又因為當時中華民國的國際形勢，而更加仇恨、強烈。¹⁰¹ 另一方面，這時正是蕭阿勤討論的「回歸現實」世代崛起的時刻，這個世代的知識份子受到 1970 年代保釣、「中日斷交」與「退出聯合國」等重大事件的影響，開始挖掘臺灣被日本統治的歷史，並用中華國族的歷史敘事來理解這段過去。¹⁰²

2 月 3 日，在機場等待川島威伸的武田義弘（第三中隊）與周志郎（第一游擊隊）在得知川島威伸無法來臺後，都露出驚訝的表情，並為此感到憤慨。2 月 4 日，山口勇三前往花蓮市以及樟原，和戰友北村利男（川島威伸的衛兵）以及和田隆（第三中隊）見面，並一同拜訪中村輝夫。幸運的是，這天當地的外省人警察署長跟監視人都不在，因而他們可以在沒有干擾的狀況下拜訪中村輝夫。他們先將戰友會準備的 3 萬慰問金（約日幣 24 萬）、紀念品以及高級座鐘交給中村輝夫，而中村輝夫也開心的用日語表達其感謝，並詢問川島隊長呢。有戰友從日本來訪的消息在村中傳開後，同村的戰友野村實（第二中隊）跟吉田稔（第四中隊）都趕來現場，山口勇三為了這相隔三十年的再會而淚流不已。聞訊而來的還有另一位監視人張欽玉，但他剛好是山口勇三中學校時的學弟，也因此戰友們可以無罣礙的暢談。他們在中村輝夫的家中喝酒慶祝，歡唱山歌以及〈別れ舟〉、〈莎韻之鐘〉、〈支那の夜〉、〈步兵の本領〉等歌曲，而中村輝夫也對他們吐露對妻子李蘭英再婚的憤怒以及現下家庭生活的困擾。由於意識到時間時已經天黑了。於是，山口勇三和同行的戰友們又在臺東過了一夜。離別時，中村輝夫握著山口勇三的手表示「要常常來喔」。¹⁰³

1975 年 8 月 12 日，摩羅泰島戰友會一行人 16 人再度來到臺灣，和臺灣的戰友們見面。¹⁰⁴ 一行人中也包括川島威伸，考量到上次被禁止入境的經驗，川島威伸對是否能入境還是有些擔心，而機場的公務員（他懷疑是憲兵）對他有些惡意，

¹⁰⁰ 趙慕嵩，《李光輝的世界》（臺北：將軍出版社，1975），頁 31、36。

¹⁰¹ 相關討論可以參考筆者的碩士論文：楊文喬，《選擇下的記憶：台籍日本兵的「國族化」（1945-197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¹⁰²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頁 172。

¹⁰³ 山口勇三，〈中村輝夫君訪問記〉，頁 439-442。

¹⁰⁴ 山口勇三，〈モロタイ戦友会訪台記〉，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443-447。

還不停詢問他舊日軍的組織和戰術。¹⁰⁵ 出機場後，他的擔憂將一掃而空。從機場的花束歡迎到烏來的鞭炮與泰雅舞蹈，都讓一行人相當感動。而最讓他們興奮的，還是跟戰友們的碰面。¹⁰⁶ 高木金二郎班長和高砂兵平井時隔三十年的碰面時相擁而泣。¹⁰⁷ 在烏來與會的，除了武田義弘、周志郎以及他們的家人外，還包括住在臺北與新竹的五位泰雅族戰友及其家人。隔日轉往花蓮，他們先去憑弔松本忠男（第四中隊）的墓，再和北村利男以及花蓮的九位阿美族戰友及其家人聚會。第三天，戰友會成員在臺東接受穿著阿美族傳統服飾的宮田武男、中村輝夫以及其他 14 名阿美族戰友及其家人（包括李蘭英）的熱烈歡迎，不知不覺間，全部的人都手牽手著忘我跳舞。第四天則來到四重溪，和串岡次郎以及其他 20 位排灣族戰友聚會。¹⁰⁸ 其中包括 1956 年在摩羅泰島被發現的國島正一以及遞交意見書的宮里一郎。¹⁰⁹ 戰友會在臺的行程讓成員們難以忘懷，不對川島威伸對未能聯絡到中部的鄒族和布農族戰友感到有些遺憾。¹¹⁰

戰友會的行程曾被臺灣的媒體報導。山口勇三也有發現這點，其在訪臺紀錄中寫下《中國時報》的報導摘要「老戰友訪問叢林生活三十年的戰友李光輝，今日在李宅舉行終戰紀念日」、「招待日本老友，日本戰友感激李光輝夫婦誠意的山地舞蹈」。不過，他也對《聯合報》不合事實的報導感到困惑，他記錄下的《聯合報》報導內容是「李光輝拒絕參加終戰紀念會，日本戰友敗興歸國」。¹¹¹ 實際上，這則《聯合報》的報導寫道，「川島威伸的請求，被李光輝所婉拒」，而報導中的李光輝更怒斥川島威伸「他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日本人強征他去南洋當炮灰，想到卅年的叢林生活，就感不快，所以不願參加勾起他痛苦回憶的任何集會」。矛盾的是，這則報導後段又寫道「但李光輝及黃光壽仍在臺東鎮的地中海餐廳宴請川島威伸等人，表示盡了地主之誼」。最後，新聞表示「川島威伸等人，對於李光輝不參加『終戰紀念會』顯然十分掃興，昨天原預定到李光輝家中去拜訪的，也

¹⁰⁵ 川島威伸，〈思い出の訪台〉，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447-448。

¹⁰⁶ 山口勇三，〈モロタイ戦友会訪台記〉，頁 446。

¹⁰⁷ 高木金二郎，〈日本のために戦った高砂兵〉，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508。

¹⁰⁸ 山口勇三，〈モロタイ戦友会訪台記〉，頁 447。

¹⁰⁹ 1956 年有九位殘留日本兵在摩羅泰島被發現，其中有六位是高砂族。關於他們的故事，筆者打算另文撰寫。目前暫可參考筆者的碩士論文：楊文喬，《選擇下的記憶：台籍日本兵的「國族化」(1945-1979)》，頁 66。

¹¹⁰ 川島威伸，〈「考える会」への参加経緯等について〉，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頁 75-79。

¹¹¹ 山口勇三，〈モロタイ戦友会訪台記〉，頁 447。

僅『禮貌的』乘坐遊覽車到東河鄉兜了一圈後，即前往四重溪」。¹¹²《聯合報》的報導或許受到 1970 年代戰爭記憶以及國民黨文化政策的影響。負責宣傳的國民黨中央第四組機關刊物《宣傳週報》中曾提到有兩個相關的文化政策：日本痕跡的消除以及反奴化教育的推廣。¹¹³ 在這樣的背景下，或許根本難以想像臺日之間存在著關係良好的戰友。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川島威伸計畫來臺拜訪中村輝夫之前，就曾有日本戰友試著打聽臺灣戰友的下落。1965 年 9 月，戰後定居在宮城縣的小出清在《聯合報》登報，希望能尋找「戰時的救命恩人謝成功」。他被美軍俘虜後在赤土山的收容所奄奄一息，是鄰床的謝成功熱心照顧才得以康復。因此希望能來臺報恩。¹¹⁴ 小出清最後順利找到這位戰友，並計畫來臺拜訪。¹¹⁵ 另外，也有試圖拜訪戰友遺族的例子。1966 年 12 月，《臺灣民聲日報》曾刊載一則宮本暢也打聽戰友江麒麟官遺族下落，並希望告知戰友遺言的報導。¹¹⁶

另外，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不是只有日本戰友單方面來臺灣，也有臺灣戰友前往日本。武田義弘在 1976 年 7 月透過公司業務考察的名義前往日本。抵達羽田國際機場後，他得到數十人的熱烈歡迎，其中包括川島威伸以及原小隊長和田芳三。面對這樣的場景，武田義弘「覺得心臟彷彿停止了，只是一個小兵卒卻讓長官們如此迎接，在臺灣沒有這樣的例子」。他們先是在東京目黑的雅敘園舉辦盛大的歡迎會，負責指揮臺灣返還的張兒雄醫官以及高砂族關係者宮村堅彌也有到場。武田義弘後來在川島威伸與和田芳三的導覽下，參拜靖國神社以及戰歿者墓苑。離別時，武田義弘發現，雖然原中隊長高丸隆因為工作的關係沒有送機，但還是請其小孩跟女兒到機場送他離開日本。這趟日本行，讓武田義弘終生難忘。而他也是在此時，將其戰記交給戰友會。¹¹⁷

¹¹² 〈邀約舉行終戰會 李光輝拒絕參加 日本人敗興而歸〉，《聯合報》，1975 年 8 月 16 日，版 9。

¹¹³ 可以參考楊文喬，〈文化政策、歷史書寫與 1970 年代的台籍日本兵集體記憶〉，《選擇下的記憶：台籍日本兵的「國族化」(1945-1979)》，頁 117-126。

¹¹⁴ 〈日人小出清 尋訪謝成功 戰時受惠難忘 圖報救命大恩〉，《聯合報》，1965 年 9 月 12 日，版 3。

¹¹⁵ 〈廿年首次傳書信 猶是當時小出清 歷盡滄桑·友情不變 近照一幀·贈君存念〉，《聯合報》，1965 年 10 月 15 日，版 3。

¹¹⁶ 江麒麟的故事相當糾結複雜，可以參考吳博臻的碩士論文《臺籍日本兵之「死」：遺族、戰友、二戰記憶與創傷》，頁 19-26；吳博臻，〈臺灣人戰歿者遺骨送還及遺族撫卹問題(1945-1975)〉，《臺灣風物》71：2(2021 年 6 月)，頁 115-146；〈日人找尋江麒麟官遺屬〉，《臺灣民聲日報》，1966 年 12 月 15 日，版 6。

¹¹⁷ 〈武田元兵長の來日〉，頁 398-399；林源治，〈日本旧友訪問〉，收於モロタイ戰友會編，《春島戰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508-509。

摩羅泰島戰友會在 1975 年 8 月 19 日離開臺灣。川島威伸、和田芳三和高木金二郎在離臺後的記述中，都不約而同提到臺灣/高砂戰友與戰歿者遺族的補償問題。和田芳三更提到「川島威伸開始執著地四處奔走，希望能早點解決臺灣戰友的戰後處理問題以及戰歿者遺族的補償，這是生死與共的我們共同的立場」。川島威伸對這趟臺灣之旅感觸頗多，不論是和臺灣戰友不變的情誼，或是宮里一郎在遞交的意見書中提到的問題：戰後生活淒慘以及戰死者家族無救濟援助。¹¹⁸ 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亞政府交涉失敗，¹¹⁹ 無法繼續前往摩羅泰島以及西部幾內亞收集遺骨的情況下，摩羅泰島戰友會此後的活動重心轉移到高砂戰友補償問題。¹²⁰

《春島戰記》曾如此回顧戰友會成立以來的事業：「戰歿者遺骨收集（包括中村兵長的生還），最重要的，現在正在進行的高砂戰友的戰後處理問題」。¹²¹ 而在 1976 年 7 月第五回與 1977 年 10 月第六回的慰靈祭上，戰友會也一再提到「高砂戰友補償問題」跟「期待實現臺灣出身軍人軍屬的補償」。¹²² 由此可見，此議題不只是少數戰友的期許，更是摩羅泰島戰友會的共同目標。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川島威伸和原師團參謀長星野一夫再度一同到厚生省陳情，¹²³ 並進一步和臺灣人原日本兵士補償問題思考會合作。¹²⁴

四、跨越臺日的戰友會：高砂戰友戰後處理問題

川島威伸在《春島戰記》一書最後的〈雜感〉寫道「高砂戰友的補償問題，正是今日的問題」。¹²⁵ 《春島戰記》出版於 1978 年 11 月 19 日，我們也因而無法再透過這本戰友會出版品，來描繪出版日之後的戰友會歷史。幸運的是，在臺灣人原日本兵士補償問題思考會編輯的《補償問題資料集》中，有不少戰友會相關的記載。特別是共有二十二號的《臺灣人原日本兵士補償問題思考會會報》（以下

¹¹⁸ 川島威伸，〈「考える会」への参加経緯等について〉，頁 75-79。

¹¹⁹ 文中並未提及失敗的原因。但可能跟 1974 年初，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印尼時發生的反日暴動（マラリ事件）有關。

¹²⁰ 山口勇三，〈モロタイ戦友会訪台記〉，頁 447；川島威伸，〈思い出の訪台〉，頁 448；高木金二郎，〈日本のために戦った高砂兵〉，頁 508。

¹²¹ 〈結成以来の経過の概要〉，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389-390。

¹²² 〈第五回慰霊祭、総会〉，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397-398；〈第六回慰霊祭、総会〉，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399-401。

¹²³ 〈星野元師団参謀長の逝去〉，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396-397。

¹²⁴ 〈高砂戦友の戦後処理問題〉，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448。

¹²⁵ 川島威伸，〈雑感〉，收於モロタイ戦友会編，《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頁 509-510。

簡稱《思考會會報》)。¹²⁶ 以下將透過《思考會會報》來探討川島威伸以及其他戰友會在補償問題上的行動。

在 1975 年 5 月發行的第 1 號《思考會會報》中，川島威伸曾投書對思考會的宮崎繁樹表達敬意與感謝，並表示他想到中村輝夫以其另外 373 名特別志願兵的部下經歷的惡戰就日夜心痛。他曾在 4 月 16 日向厚生省大臣提出陳情，希望未來可以在宮崎繁樹的指導下，貢獻自己的心力。¹²⁷ 由此可見，在戰友會的臺灣之旅之前，川島威伸就已對補償問題有想法，而臺灣之旅則是更堅定他的信念。隔年 9 月的第 3 號《思考會會報》則刊載川島威伸遞交內閣總理大臣的陳情書，這篇陳情書希望能處理臺灣籍軍人軍屬以及戰歿者遺族的問題。¹²⁸ 除了撰文陳情之外，川島威伸跟摩羅泰島戰友會在思考會成立的初期，也因為擔心思考會的資金問題而捐款甚多。¹²⁹

從《思考會會報》紀錄的捐款名單中，可以注意到很多戰友會都曾捐款給思考會。基佐江里曾在《聞け！血涙の叫び：旧台湾出身日本兵秘録》一書中，整理曾支援補償問題的戰友會，¹³⁰ 除了川島威伸主持的摩羅泰島戰友會外，還有溪州會、¹³¹ 臺灣會、¹³² 南星會、¹³³ 林經會、¹³⁴ 全國索羅門會、¹³⁵ 拉包爾方面戰友會、¹³⁶ 特設水上勤務第一一中隊戰友會。¹³⁷ 而在《思考會會報》中，可以注意到更多戰友會的投入，¹³⁸ 早期捐款最積極是川島威伸及其主持的摩羅泰島

¹²⁶ 〈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報〉(1-22 号)，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頁 850-1035。

¹²⁷ 川島威伸，〈中村さんの上官として心痛〉，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頁 854。

¹²⁸ 川島威伸，〈台湾籍軍人軍属に対する戦後処理問題についての陳情書〉，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頁 863。

¹²⁹ 〈モロタイ戦友会 活動資金をカンパ〉，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頁 863。

¹³⁰ 基佐江里編，《聞け！血涙の叫び：旧台湾出身日本兵秘録》(東京：おりじん書房，1986)，頁 370-371。

¹³¹ 溪州会，台湾溪州陸軍病院戦友会。會長長井勇。

¹³² 台湾会，台湾軍司令部戦友会。會長諫山春樹。

¹³³ 南星会，旧台湾守備隊改編 48 師団戦友会。會長森晴治。

¹³⁴ 林经会，ビルマ第十五軍経理関係戦友会。會長飯盛徳秀。

¹³⁵ 全国ソロモン会，ソロモン方面戦友会。會長浜崎積三。

¹³⁶ ラボール方面戦友会。會長大田庄一。

¹³⁷ 特設水上勤務第一一中隊戦友会。會長兒玉立志。

¹³⁸ 推測部隊中越多臺灣人的戰友會投入意願會越高，如濠北一二五會的成員提到，由於過往部隊中有許多臺灣軍屬，因而希望希望協助思考會；〈濠北一二五会も協力も約束〉，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頁 916。

戰友會還有兒玉立志及其主持的特設水上勤務第一一中隊戰友會，後者也是捐款金額最多的戰友會。隨著補償問題的發展，在中後期投入捐款的戰友會越來越多，如第四十八師團司令部會、全國抑留者補償協議會、原臺灣山砲蓬萊山吹會、陸士 58 期生會、海軍二一二設學隊戰友會、緬甸觀音佛祖會……等等諸多戰友會都有投入。¹³⁹ 另外，也有不少個人的投入，如原臺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西伯利亞滯留者吳正男、《少年上戰場》以及《失落祖國的人》的作者磯村生得都是捐款名單的常客，甚至「昭和的參謀」之稱的瀨島龍三也曾捐款。如果能有更多戰友會的名錄，或許會能比對出更多個人名義的捐款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戰友會早期是集體以戰友會名義捐款，後來則逐漸轉為個人捐款，這可能跟戰友們逐漸凋零，戰友會停止活動有關。如摩羅泰島戰友會雖然在中後期消失，但在捐款名單上還是持續可以看到川島威伸或是其他戰友會成員的身影。¹⁴⁰

川島威伸以及摩羅泰島戰友會（特別是和田芳三與山口勇三）相當積極參加思考會的活動。不論是懇談會、¹⁴¹ 市民集會，¹⁴² 或是思考會集會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直到 1987 年的最後一次集會，都還是可以看到川島威伸的出席。¹⁴³ 而在這些集會上，也時常看到其他戰友會的參與者，特別是特設水上勤務第一一中隊戰友會世話人兒玉立志以及臺灣步兵第二連隊戰友會世話人竹井巖。從幹事會的活動報告中，也可以看到川島威伸忙碌地參加各種幹事會的紀錄。¹⁴⁴

在川島威伸參加的種種活動中，最重要的或許是他曾在第十一回公判上擔任證人。¹⁴⁵ 早在提訴準備時，川島威伸就曾參加相關會議。¹⁴⁶ 1979 年 10 月 22 日下午，旁聽席有五十多位摩羅泰島戰友會的相關人士出席，訴訟的原告是原游擊隊的一等兵竹中武夫（全永福），川島威伸在証言中，回顧摩羅泰島戰役以及他和

¹³⁹ 投入的戰友會甚多，在此僅摘列其中幾個。

¹⁴⁰ 〈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会報（1-22 号）〉，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頁 850-1035。

¹⁴¹ 〈53 年 12 月 17 日の懇談会 台湾情勢に深い関心〉，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頁 885。

¹⁴² 〈市民集会出席者〉，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頁 895。

¹⁴³ 〈集会出席者〉，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頁 1011。

¹⁴⁴ 〈「幹事会」活動報告〉，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頁 940。

¹⁴⁵ 〈川島氏が証人 次回公判 10 月 22 日〉，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頁 892。

¹⁴⁶ 〈提訴の準備整う 7 月 10 日の共同集会〉，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頁 877。

高砂兵一同作戰的歷史，¹⁴⁷ 並最後表示「雖然日本人的長官領著撫恤金，作為部下的高砂族卻一點補償都沒有。何況在沒有協議的情況下就不返還軍事貯金……大概會成為後代的笑柄吧……」。¹⁴⁸ 川島威伸相當重視這場證言，他曾在刊載於《歴史と人物》的文章中提到，衷心希望日本可以以此為立足點，做出不會後悔的處置。¹⁴⁹ 在 1982 年讀賣新聞的採訪裡，69 歲的川島威伸在千葉柏市的家中，和記者回憶起戰時的種種「承蒙高砂兵的大家對我的關照，常常吃到用陷阱捕捉的山豬。終戰過後，大家對日本人的態度始終沒有改變。總算要復員，跟大家告別時，所有人都大聲哭泣，當時內心的激動一輩子都忘不了」，並表示「至少要讓大家得到補償，這是作為舊軍人的我最後的願望」。¹⁵⁰

法律上的投入外。川島威伸也給思考會帶來意外的連結。1983 年 11 月初，直木賞作家，同時也是《スニヨンの一生》的作者佐藤愛子，¹⁵¹ 招待川島威伸與山口勇三到家中，並委託他們將《スニヨンの一生》原稿的一部分以及五十萬圓轉交思考會。原來，佐藤愛子在撰寫這本作品時，曾從《春島戰記》大量取材。¹⁵² 而川島威伸也曾協助佐藤愛子，將其誤記的地方加以校正。¹⁵³ 此後，佐藤愛子除了持續捐款、關注補償問題外，甚至曾在思考會的集會上發表演講。¹⁵⁴ 這樣的網絡的延伸，也可以算是川島威伸努力的成果之一吧。

除了戰友會外，還有不少日本人在補償問題時回想起和臺灣戰友互動或共享苦難的過往，並希望政府可以一視同仁的對臺灣戰友加以補償。有不少民眾投稿報刊：¹⁵⁵ 64 歲的東京會社員大谷行已投稿〈不能忘記臺灣人軍屬〉，回顧戰時他和一位誠實的臺灣青年在呂宋北部逃亡的過往；¹⁵⁶ 74 歲已退休的山口縣森光周

¹⁴⁷ 〈川島威伸氏 証人調書（第十一回口頭弁論）〉，頁 203-217。

¹⁴⁸ 〈川島元隊長感動の証言 第 11 回公判 証人尋問で〉，收於台灣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灣・補償・痛恨—台灣人元日本兵戰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一》，頁 898。

¹⁴⁹ 川島威伸，〈モロタイ島高砂兵の勇戦〉，頁 84。

¹⁵⁰ 〈〔追跡〕5〉台灣の元日本兵 悲嘆の戦後、息子の痛み〉，《讀賣新聞》，1982 年 4 月 5 日，版 14。

¹⁵¹ スニヨン即是中村輝夫（李光輝）的日本名。

¹⁵² 〈台灣人戰死傷者の象徴「スニヨンの一生」 佐藤愛子さんが原稿料をカンパ〉，收於台灣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灣・補償・痛恨—台灣人元日本兵戰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一》，頁 964。

¹⁵³ 佐藤愛子，《スニヨンの一生》，頁 222。

¹⁵⁴ 佐藤愛子，〈現代日本人へ警鐘〉，收於台灣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灣・補償・痛恨—台灣人元日本兵戰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一》，頁 1010-1011。

¹⁵⁵ 由於《補償問題資料集》中並未每則報導都加註新聞來源，因此這些報導出自哪個新聞社仍有待查證。

¹⁵⁶ 大谷行已，〈忘れられぬ台湾人軍属〉，收於台灣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灣・補償・痛恨—台灣人元日本兵戰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一》，頁 389。

一則想起曾在某個被敵機反覆轟炸的太平洋小島上，和臺灣人一同艱苦的勞動；¹⁵⁷ 在《思考會會報》上也有類似的投書：在臺灣的高射砲部隊擔任中隊長的山本夫回想起 1945 年時的一場空戰惡鬥中陣亡的六名內地人及嚴重受傷導致身障的臺灣戰友。這位臺灣戰友自願入隊且成績相當優秀。山本夫積極地打探這位戰友的住所想要加以慰問，最終在 1975 年 5 月如願以償；¹⁵⁸ 在臺灣成長，曾任東京高裁裁判長的三井明也想起戰時在臺灣擔任陸軍司政官時，和臺灣少年兵的友好互動；¹⁵⁹ 因學徒出陣被徵集到海軍，最後被派往高雄海兵團的永安勉在終戰前和臺灣特別志願兵戰友「生死苦樂與共」，並於相隔三十年後，在部下的邀請下再度來到臺灣；¹⁶⁰ 森晴治則是在戰後四十年才再度來到臺灣，並得到臺灣戰友的熱烈歡迎。¹⁶¹

在這些投書中，值得注意的有兩點。首先，可以看到不少日本戰友時隔多年來臺探訪戰友的例子。除了本文的主角摩羅泰島戰友會外，積極投入補償問題的特設水上勤務第一一一中隊戰友會也曾組團來臺，隊長兒玉立志提到在短短的幾天內就和一百三十多位舊隊員見面。¹⁶² 日本各地的臺步二會（臺灣步兵第二連隊戰友會）在 1970 年到 1976 年間曾七次組團來臺探訪特別志願兵戰友，會長也曾特別來臺探視中村輝夫。¹⁶³ 這樣的來訪延續多久無法確定，但東日本臺步二會的 28 名戰友會成員在 1978 年仍來臺灣長達十天之久。¹⁶⁴ 再者，「戰友」逐漸成為描述所有臺灣人原日本兵的代稱，就連沒有實際和臺灣人原日本兵並肩作戰的民

¹⁵⁷ 森光周一〈台湾人元日本兵への補償は人道上的問題〉，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同冊一》，頁 397。

¹⁵⁸ 可惜的是，山本夫並未寫出這位臺灣戰友的名字；山本夫，〈台湾の戦友を思う—中隊長として—〉，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同冊一》，頁 873。

¹⁵⁹ 三井明〈道義に逆らえば国亡ぶ 訴訟と立法促進平行は有効〉，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同冊一》，頁 907。

¹⁶⁰ 永安勉，〈台湾人元日本兵の補償問題〉，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同冊一》，頁 950。

¹⁶¹ 森晴治〈訪台のたびに 心苦しい思い〉，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同冊一》，頁 972。

¹⁶² 兒玉立志〈戦争の傷痕 台湾に旧隊員を訪ねて〉，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同冊一》，頁 864。

¹⁶³ 竹井巖〈台湾人特別志願兵と台歩二会〉，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同冊一》，頁 79-82。

¹⁶⁴ 〈台湾の戦友を親善訪問〉，收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同冊一》，頁 886。

眾也表示「對臺灣戰友的補償是應該的」。¹⁶⁵ 亦有人用「我們父親的戰友、我們祖父的戰友、我們日本民族的戰友」來理解臺灣人原日本兵。¹⁶⁶

必須強調的是，臺日戰友之間的交流是雙向的，並不是只有日本戰友來到臺灣，臺灣戰友也會前往日本。除了先前提到的武田義弘外，在補償問題時期，臺灣戰友前往日本參加裁判時，也會受到日本戰友的熱烈歡迎：鄧盛前往日本參加裁判時，受到三個戰友會的代表川島威伸、兒玉立志以及竹井巖的招待，還曾在兒玉立志京都的家中過夜；特設水上勤務第一一中隊戰友會的「中心人物」王林樞在前往美國旅行途中，曾到日本旁聽裁判，並和兒玉立志隊長見面；竹中武夫前往日本擔任原告時，也是受到摩羅泰島戰友會的接待。¹⁶⁷ 而臺步二會在 1970 年到 1976 年間，亦有五位臺灣戰友前往日本，其中黃少廷一個人就去了兩次。¹⁶⁸ 解嚴後，第四回特設勤勞團的邱景耀開始聯絡日本戰友，¹⁶⁹ 並在 1990 年代多次前往日本拜訪戰友並參加慰靈祭；而他的日本戰友及其家人們也時常來臺交流。¹⁷⁰ 這種交流延續很久，直到進入 21 世紀，戰友會逐漸解散時，仍有臺灣的戰友前往日本。曾任特設勤勞團分隊長的原日本軍屬劉英輝，在 2004 年 11 月前往日本參加位於千葉縣的第十野戰氣象隊戰友會聚會。值得一提的是，這場聚會也和補償問題有關，聚會的氛圍十分感傷，一方面是戰友們「彼此年齡已高，決定解散戰友會」，另一方面他們哀悼著臺灣人原日本兵戰友與遺族的「悲苦境況」。於是，這個戰友會決定「把該會結餘的十五萬日圓，託付劉英輝帶回臺灣濟助幾名生活困苦的戰友或遺族」。¹⁷¹

¹⁶⁵ 中川直之〈台灣の戦友への償いは当然〉，收於台灣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灣・補償・痛恨—台灣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頁 400。

¹⁶⁶ 野田和昭，〈編輯後記〉，收於台灣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灣・補償・痛恨—台灣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頁 1035。

¹⁶⁷ 〈鄧氏行程〉，收於台灣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灣・補償・痛恨—台灣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頁 885；〈王林樞氏來日〉，收於《台灣・補償・痛恨—台灣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頁 896；〈全永福氏 本人尋問で來日かつての高砂族勇士朴訥な日本語で答弁〉，收於台灣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灣・補償・痛恨—台灣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頁 893。

¹⁶⁸ 竹井巖，〈台灣人特別志願兵と台歩二會〉，頁 79-82。

¹⁶⁹ 根據邱景耀之子邱文華的回憶，邱景耀之所以跟其中一位戰友佐藤班長關係要好，是因為當年「佐藤先生在戰地被子彈打到腳，不良於行，我爸爸揹他，他們兩個人感情才會那麼好」；邱文華口述，〈八塊文史另一章—邱文華訪談紀錄（邱景耀的長子）〉，收入《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14），頁 120-121。

¹⁷⁰ 邱景耀口述〈戰地歸來 七年牢災—邱景耀訪談紀錄〉，收入《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頁 108-110。

¹⁷¹ 李展平，《前進婆羅洲：臺籍戰俘監視員》（南投：臺灣文獻館，2005），頁 160；〈日本老戰友 濟助台籍軍伕〉（2005 年 2 月 2 日），「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152>，2022 年 10 月 10 日瀏覽。

最後，補償問題時期，浮現的不只是關於臺日戰友互助或共享苦難的記憶，還有黑暗的過去。1980年9月發行的第9號《思考會會報》刊載一則原日本軍官高宮廷二在呂宋自殺的消息。¹⁷² 從高宮廷二的日記來看，他的自殺早有計畫，從3月6日開始倒數100日，逐日倒數著他的死亡，直到第0日的6月14日——35年前的6月14日，當時身為陸軍中尉的高宮廷二處死了兩位臺灣少年兵——這讓高宮廷二痛苦一生，雖然其曾再訪呂宋慰靈，尋找死去的戰友們，最後仍決定以死贖罪。在最後兩天的日記，其寫到「無法忘記臺灣少年隊的悲慘」、「我無法忘記曾殺死自己的部屬」。¹⁷³ 高宮廷二在《消失在呂宋》這本以自身經歷改寫的小說中曾寫到這段過去。由於制空權被美軍掌握，與飛行場有關的部隊改編，135位13到16歲的臺灣少年傭人被整編到他的單位。小說的主角秋葉不懂為何政府要徵召這麼年輕的青年，但也只能接受。而為了應對持續的空襲，這些青年不斷從事挖掘地下壕的嚴苛勞動，並出現逃亡者。部隊曾對如何處置逃亡者有種種意見，但有過向美軍投降的逃亡者揭露日軍陣地，而導致部隊被集中砲擊的慘痛經驗。最後的結論是「為了拯救數百人的生命，一人的罪無可赦免」。某日，西野伍長帶來兩位一個月前逃亡的臺灣青年……¹⁷⁴ 早期的部隊史由於考量到「英靈」、慰靈或是遺族的情感，通常較少提到戰場黑暗醜陋的面向。到1970年代後，才開始浮現種種對軍隊、長官的批判，戰場的淒慘或是加害行為的紀錄，並在1970年代末期起更加露骨。¹⁷⁵ 《消失在呂宋》的作者高宮廷二就是在這種部隊史轉變以及補償問題浮現的脈絡下，撰寫《消失在呂宋》，並決定要回到呂宋結束自己的生命。

¹⁷² 該新聞為〈わが魂は比国の土に 元日本軍將校、ルソンで自殺 単身移住戦友弔う日々〉，《朝日新聞》（東京・朝刊），1980年7月19日，版23；〈資料 台湾少年兵の処刑〉，收於台灣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一》，頁912。

¹⁷³ 朝日新聞的名古屋曾有過五篇連載討論這個事件，相關資訊如下：〈旧戦地ルソンに死す 日本軍將校の35年 現地に戻り償いの日々 慈善重ねつつ 戦友の霊弔う〉，《朝日新聞》（名古屋・朝刊），1980年8月11日，版12；〈旧戦地ルソンに死す 日本軍將校の35年 傭人たちの処刑も記述 悲惨な体験をノートに残す〉，《朝日新聞》（名古屋・朝刊），1980年8月12日，版12；〈旧戦地ルソンに死す 日本軍將校の35年 しょく罪の旅を重ねる 帰国から30年 うずき続く心〉，《朝日新聞》（名古屋・朝刊），1980年8月13日，版16；〈旧戦地ルソンに死す 日本軍將校の35年 この土に還りたい 帰国の誘いに 微笑し応じず〉，《朝日新聞》（名古屋・朝刊），1980年8月14日，版12；〈旧戦地ルソンに死す 日本軍將校の35年 償い果たし人生に決着 風化を拒んだ 戦場での体験〉，《朝日新聞》（名古屋・朝刊），1980年8月15日，版16。

¹⁷⁴ 高宮廷二將這本書獻給「太平洋戰爭中犧牲的菲律賓人、比島作戰死去的日本士兵以及臺灣少年隊的成員們」；高宮廷二，《ルソンに消ゆ》（東京：白馬出版社，1975），頁96-98、153-156。

¹⁷⁵ 吉田裕，《兵士たちの戦後史》，頁156-157、183-189、209-214。

1988 年 7 月 15 日發行了第 21 號《思考會會報》，主題是補償問題的正式立法以及補償金額正式編入預算確定為兩百萬。這號也刊載了筆者所知川島威伸的最後一篇投稿。在這篇短文中，川島威伸感謝思考會以及有馬元治對立法的貢獻。而他也提到已經長眠的鄧盛、蘇鈴木、全永福、王育德、秋本英男以及兒玉立志，並希望他們的遺族可以替這個結果感到開心。¹⁷⁶

五、結論

日本人真的遺忘了臺灣人原日本兵嗎？筆者在前言曾回顧藍適齊的相關研究，並提出這個質疑。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本文用了三個小節回顧戰時到戰後臺灣人與日本人戰友之間的互動。或許是因為藍適齊引用的資料以中文為主，而使其未能注意到補償問題時期在日本新聞及戰友會出版品中廣泛出現的臺灣與日本戰友的交流。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群掛念著臺灣戰友，並亟欲替其爭取權益的日本人，特別是戰友會的成員們。他們的情誼與行動，跨越了戰前內地／殖民地以及戰後日本／中華民國的疆界。在本文，筆者利用日本與臺灣的報紙、戰友會出版品、補償問題相關資料與國家檔案管理局檔案，以川島威伸以及摩羅泰島戰友會為主角，探討這段臺灣戰友與日本戰友交流的歷史，回顧他們一同經歷的戰爭以及他們一同的行動，不論是慰靈、遺骨收集或是補償問題的爭取。

在 2023 年的今天，經歷過戰爭的戰友會成員已逐漸成為過去，戰友們跨越臺日的交流也是。¹⁷⁷ 吉田裕在 2011 年出版《兵士たちの戦後史》的開頭就是「消失的戰友會」。¹⁷⁸ 2014 年 8 月，日本知名建築師津端修一來臺參加《積存時間的生活》新書發表會時，計畫順道拜訪在神奈川縣高座工廠相識的少年工陳清順，但意外發現陳清順早在 1952 年死於白色恐怖。津端修一後來和妻子前往六張犁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憑弔，他先是跪在陳清順的墓前，接著「突然擁抱墓碑並唱

¹⁷⁶ 川島威伸〈有馬会長の手記を拝読して〉，收於台灣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灣・補償・痛恨—台灣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頁 1016。

¹⁷⁷ 雖然親身經歷戰爭的第一代戰友會成員已逐漸消逝，但部分的戰友會仍由第二代、三代延續著戰友會的運作，定期慰靈、前往戰地憑弔，甚至從事遺骨收集的活動。而引言提到的高座會也保持著臺灣與日本的交流。可以參考「全国ソロモン会」與「日台高座友の会」的 Facebook 頁面。

¹⁷⁸ 吉田裕，《兵士たちの戦後史》，頁 2。

起〈臺灣軍之歌〉」。¹⁷⁹ 津端修一在 2015 年 6 月逝世。¹⁸⁰ 他對少年工的記憶，也可以說是臺日戰友間的記憶，也隨之而離去。

不過，雖然臺日戰友之間的記憶消失了。我們還是有機會，透過他們留下來的文字，不論是他們的回憶錄或是戰友會的出版品，來重構他們的歷史。筆者相信，這是很有潛力的研究方向。舉例來說，特設水上勤務第一一一中隊戰友會跟兒玉立志隊長以及臺灣步兵第二連隊戰友會跟竹井巖世話人都當相當積極參加思考會的活動，甚至曾扮演相當吃重的角色，如特設水上勤務第一一一中隊戰友會的千葉泰介曾多次前往臺灣各地調查，撰寫臺灣人原日本兵以及戰歿者遺族的相關報告。¹⁸¹ 如果能以各個不同的戰友會為主體，挖掘相關資料及歷史，相信能有更多的發現，並更豐富臺日戰友的交流史，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能重新透過日本的視角以及材料來找回臺灣人過往被遺忘的戰爭經驗。此外，值得繼續思考的，還有臺灣人原日本兵跟朝鮮人原日本兵的比較研究。臺灣人一般而言會被認為較朝鮮人（韓國）親日，在戰友的部分也是如此嗎？這種現象是普遍的嗎？而這樣的情形是否隨著不同時代與政治情境而有所變化？筆者仍在思索這個問題並蒐集相關資料，期待有朝一日能得到解答。

1992 年 10 月 1 日，思考會出版第 22 號，也是最後一號《思考會會報》，並在會報中報告思考會解散的消息。在最後一頁的〈編輯後記〉中，野田和昭寫道「現在，死去的原告鄧盛、蘇鈴木、全永福的面容在我眼前浮現。另外，『思考會』的王育德先生、秋本英男辯護團長、兒玉立志隊長、川島威伸隊長以及許多其他人，都已經在地下長眠了。他們的精神支持著我們到現在」。¹⁸² 川島威伸死於 1989 年 2 月 9 日，在補償問題接近解決後不久就離世了，也因而無法見到思考會的最後。不過，他支持著思考會以及臺灣人原日本兵戰友的精神，將被書寫成歷史，並成為跨越臺日的戰友研究的開始。

¹⁷⁹ 津端修一在東京大學就學時被徵調到高座工廠，時任中尉，；陳婉真，〈青春歲月的淬鍊——台灣少年工詹獻煌〉，收於《台灣兵：重尋一段被歷史遺忘的血淚青春》（臺北：國家人權委員會，2022），頁 161-162。

¹⁸⁰ 〈津端修一さん死去〉，《朝日新聞》，2015 年 6 月 8 日，版 34。

¹⁸¹ 千葉泰介，〈特設水上勤務第一一一中隊戰友会の補償問題に関する運動經過〉，收於台灣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灣・補償・痛恨—台灣人元日本兵戰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頁 69-71。

¹⁸² 野田和昭，〈編輯後記〉，頁 1035。

引用書目

《中央日報》

《中國時報》

《臺灣民聲日報》

《自由時報》

《朝日新聞》

《聯合報》

《讀賣新聞》

吳博臻

- 2021 〈臺灣人戰歿者遺骨送還及遺族撫卹問題(1945-1975)〉，《臺灣風物》71(2)：115-146。

吳博臻

- 2022 《臺籍日本兵之「死」：遺族、戰友、二戰記憶與創傷》。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明益

- 2007 《睡眠的航線》，新北：二魚文化。

黃智慧

- 2011 〈解讀高砂義勇隊的「大和魂」：兼論臺灣後殖民情境的複雜性〉，《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1(4)：139-174。

モロタイ戦友会

- 1978 《春島戦記：あゝモロタイ》，東京：モロタイ戦友会。

遠藤美幸

- 2018 〈「戦友会」の変容と世代交代：戦場体験の継承をめぐる葛藤と可能性〉，《日本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14：9-21。

基佐江里編

- 1986 《聞け！血涙の叫び：旧台湾出身日本兵秘録》，東京：おりじん書房。

菊池一隆

- 2018 《日本軍ゲリラ台湾高砂義勇隊：台湾原住民の太平洋戦争》，東京：平凡社。

吉田裕

- 2011 《兵士たちの戦後史》，東京：岩波書店。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

- 2014 《總力戦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栗原俊雄

- 2015 《遺骨：戦没者三一〇万人の戦後史》，東京：岩波書店。

原剛、安岡昭男編

2003 《日本陸海軍事典コンパクト版（上）》，東京：新人物往來社。

溝口郁夫

2012 《秘録・ビルマ独立と日本人参謀：野田毅陣中日記》，東京：国書刊行会。

高宮亭二

1975 《ルソンに消ゆ》，東京：白馬出版社。

高橋三郎、高橋由典、新田光子等著

2005 《新装版 共同研究・戦友会》，東京：インパクト出版会。

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編

2022 《台灣兵：重尋一段被歷史遺忘的血淚青春》，臺北：國家人權委員會。

佐藤愛子

1984 《スニヨンの一生》，東京：文藝春秋。

三島由紀夫著、劉子倩譯

2021 《假面的告白》。新北：大牌出版。

周婉窈主編

1997 《臺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鍾肇政

2000 《鍾肇政全集 9》，桃園：桃園縣立文化中心。

新井雄

2017 〈日臺關係與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以有馬元治的活動為中心〉，《大仁學報》51：133-148。

清水亮

2022 《「予科練」戦友会の社会学：戦争の記憶のかたち》，東京：株式会社新曜社。

川島威伸

1979 〈モロタイ島高砂兵の勇戦〉，《歴史と人物》（東京）9(8)：78-84。

戦友会研究会

2012 《戦友会研究ノート》，東京：青弓社。

泉谷達郎

1989 《ビルマ独立秘史：その名は南機関》，東京：徳間書店。

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集

1993 《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一》，東京：出版者不詳。

陳柏棕

2013 《軍艦旗下：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1943-1945）》，臺北：國史館。

陳柏棕

- 2018 《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海軍史》，新北：月熊出版。

陳柏棕

- 2019 〈臺籍戰歿日本兵紀念場域的形塑：以新竹北埔濟化宮為例〉，《國史館館刊》62：165-198。

陳鵬仁、王雪娥編

- 2007 《世紀之足跡：臺灣人日本海軍志願兵》，臺北：致良。

陳德儀著、林哲次譯

- 2017 《一位高砂志願兵的摩洛泰島戰記》，臺東：臺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

陳鈺琪

- 2020 《王育德與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田中俊男

- 1996 《陸軍中野学校の東部ニューギニア遊撃戦：台湾高砂義勇兵との戦勝録》，東京：戦誌刊行会。

杜正宇、陳姿仰

- 2017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館藏許昭榮、林阿貞捐贈文獻之評析〉，《高雄文獻》7(1)：6-44。

土橋和典

- 1994 《忠烈拔群・台湾高砂義勇兵》，東京：戦誌刊行會。

浜井和史

- 2014 《海外戦没者の戦後史：遺骨帰還と慰霊》，東京：吉川弘文館。

浜井和史

- 2021 《戦没者遺骨収集と戦後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

保阪正康

- 1994 〈戦友会の八月〉，《文藝春秋》72(10)：268-283。

門脇朝秀編

- 1994 《台湾高砂義勇隊一その心には今もなお日本が一》，東京：あけぼの会。

楊文喬

- 2018 《選擇下的記憶：台籍日本兵的「國族化」(1945-197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展平

- 2005 《前進婆羅洲：臺籍戰俘監視員》，南投：臺灣文獻館。

國家檔案管理局藏

- 1974 〈日本富士電視公司要求透過臺灣電視公司安排轉播李光輝與其在日本長官川島威伸電視會談節目事〉，《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檔號：0062/0636/R00001/011/028。

國家檔案管理局藏

- 1975 〈頃接日本富士電視公司報導局節目報導部部長植木雄輔來處洽請協助該公司企畫透過「臺灣電視公司」與「富士電視」衛星轉播安排李光輝君與其原屬部隊直屬長官川島威伸作遠隔見面會談節目事〉，《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檔號：0062/0636/R00001/011/029。

臺灣中日海交聯誼會編

- 1990 《和平英魂觀音亭：靈安故鄉紀念碑落成慶典暨臺灣中日海交聯誼會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紀念特刊》，臺中：臺灣中日海交聯誼會。

蔡慧玉

- 1996 〈台灣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初探：「潘朵拉之箱」〉，《臺灣史研究》，3(1)：174-228。

蔡政良

- 2011 《從都蘭到新幾內亞》，臺北：玉山社。

蕭阿勤

- 2010 《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蕭明禮、朱宏源

- 2020 〈日本侵緬之戰（1940-42）與臺灣的角色〉，《亞太研究論壇》，67：1-40。

Lan, Shi-chi Mike.

- 2013 “(Re-) Writing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Forgetting and Remembering the Taiwanese-Native Japanese Soldiers in Postwar Taiwan” *Positions* 21(4): 801-851.

Trefalt, Beatrice.

- 2017 “Collecting Bones: Japanese Missions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War Remains and the Unfinished Business of the Asia-Pacific War” *Australian Humanities Review* 61(5): 145-159.

Trefalt, Beatrice.

- 2003 *Japanese Army Stragglers and Memories of the War in Japan, 1950-1975*. London: Routledge.

Trefalt, Beatrice.

- 2015 “The endless search for dead men: Funasaka Hiroshi and fallen soldiers in post-war Japan” In Twomey, C. & Koh, ed., *The Pacific War: Aftermaths, remembrance and culture*, pp. 270-281. Abingdon Oxon UK: Routledge.

Cross-border Comrades: Kawashima Takenobu, Morotai Island Comrades Association, and the Taiwanese Imperial Japan Serviceman

Wen-Chiao Yang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n 1945, Japanese and Taiwanese soldiers who had fought together on the battlefield were separated into two different countries. However, their communication continued. Even in the mid-to-late 1970s, some pre-war Japanese soldiers and Taiwanese Imperial Japan Servicemen were standing on the same front line, demanding compensation from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movement for Taiwanese Imperial Japan Servicemen to seek compensation from Japan stems from the discovery of Nakamura Teruo (Amis name: Suniuo; Chinese name: Li Kuang-Hui), the last Japanese straggler, on Morotai Island in Indonesia in December 1974.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a Japanese soldier spanned the pre-war period, Nakamura Teruo's discovery, and the subsequent compensation movement. This Japanese soldier is the protagonist of this article, Major Kawashima Takenobu: During the war, Kawashima Takenobu fought alongside Nakamura Teruo and other Tagasago Volunteer Soldiers on Morotai Island; after the war, Kawashima went to Morotai Island to console the soul of the dead and collect the remains of comrades, where he learned that there was a Japanese soldier still stranded in the jungle and managed to rescue him, the soldier is Nakamura Teruo; before Kawashima passed away in 1989, he represented the Morotai Island Comrades Association in the compensation movement and testified for the Taiwanese Imperial Japan Servicemen in court.

Kawashima Takenobu 's life spanned the wartime and post-war history of Taiwanese Imperial Japan Servicema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lesser-discussed history of Japanese-Taiwanese Comrades through a retrospective of Kawashima Takenobu 's life, his interactions with Taiwanese Imperial Japan Serviceman, and the postwar history of the Japan Comrades Association.

Keywords: Comrades · Repatriation of War Remains · Kawashima Takenobu · Nakamura Teruo · Taiwanese Imperial Japan Serviceman compensation movement

